

名家文化

精品丛书

治学方法

胡适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学方法 / 胡适著, - 沈阳 :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1
(名家文化精品丛书·第一辑 导学精品 / 卞孝萱、张国星主编)
ISBN 7-205-04732-3

. 治... . 胡... . 治学方法 - 文集 . G7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5391号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606所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字数：49千字 印张：2 1/2

印数：1-6,000册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于景祥

责任校对：宋毓培

封面设计：刘冰宇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4.00元

名家文化精品丛书·第一辑导学精品

编委会

主 编： 卞孝萱 张 国 星

编 委： 卞孝萱 张 国 星 张 庆 善

总序

20世纪过去了，21世纪开始了。这个新世纪的总体特征，我们现在难以先知先觉，更难做出十分准确的把握；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个知识的发展呈爆炸形态的世纪，是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纪。在这样的世纪里，一个人，尤其是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真才实学是难以立足的。所以，如何读书学习，如何掌握过硬本领，成为一个真正有聪明才智的人，是世纪性的课题，是每个在新世纪中生活的人都必须回答的一张严肃的考卷。要解决好这一问题，要为这张考卷做出完美的答案，找到一个正确的门径，找到科学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工如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找到正确的门径，就可以事半功倍，左右逢源；而误入歧途，必然事倍功半，南辕北辙，离开真正的目标越来越远。

那么，读书、治学的科学门径在哪里呢？虽然新世纪条件下如何读书、如何治学还不易做出科学的预见，但是鉴往可以知今，总结过去可以推知现在。20世纪直至今天的一些著名学者，特别是一些学术大师们读书与治学的路径和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确实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尤其是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黄侃、鲁迅、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等学术大师，他们当年所处的新

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交会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经济文化全球化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所以他们在知识结构的重组和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特别是他们在一些学科上有开辟意义、有示范作用、可为我们开启法门的经典之作，对我们更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能使我们获得思想上的灵感，少走一些弯路，尽早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走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境界。

当然，诸位名家，尤其是那些学术大师的著作部头较大，今天的读者，不易通读，也不易把握精髓；常常有望洋兴叹之感。有鉴于此，我们从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的实际需要出发，以读书与治学的方法、门径为主题，以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大专院校学生较快地解决治学方法、门径问题为宗旨，从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精选出反映他们读书、治学方法精髓，又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部头著作和有代表性的单篇文章，编辑成每本几万字的小书，避免大而全，力求少而精；以小见大，以少总多；使广大读者，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学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比较容易地把握著名学者、尤其是学术大师们求知与治学方法的精华，找到科学的治学门径，把握读书、治学的要领，提高学习效率，早日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国家栋梁，在21世纪里，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编 者

2000年1月

前言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而其影响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20世纪的新旧交替之际，他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破旧立新”的治学理论和治学方法。通过认真的探索，他确信有一种最基本，也是最广泛、最适用的科学方法，这就是“实验主义”，其精髓就是崇尚怀疑精神，不盲从已有的定论，不迷信圣贤和权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并用十分精练的语言把这种治学思想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个字。

公平地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失为十字治学格言。它揭示了科学研究中的部分而且必要的思维过程，特别是包含了一种鼓励探索、反对主观武断的合理因素，体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求实精神。这里的“大胆的假设”不是凭空的、异想天开的“假设”，而是建立在“细心搜求事实”（《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3）的基础上的，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其关键在于指导人们在科

学研究中为其“假设”求得充分而可信的证据，让事实说话，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小心的求证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他认为，真正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胡适文存》三集卷2），“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虽然胡适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这种提法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即他认为假设只供参考之用，并不反映研究对象的原有内含，认为人类认识的进步并不表明人们对掌握自然界能力的提高，而只是用一个更为圆通的假设取代前此的假设，出现人类能否掌握客观真理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这种治学理论确实是适用而且有效的。他本人正是本着这一严谨的治学态度，以敢于创新而又“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求实精神，在文学史、哲学史，以至于佛学等诸多领域作出了颇有创见的探索，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在当时，不能不说他为中国现代学术开辟了新的天地。例如在“红学”领域，他是“新红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他所得出的学术结论和所用的方法，但他在“红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确定不移的。他的这一贡献的重要成果是其《红楼梦考证》，此书便处处体现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治学精神，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宣称的：“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而其最见功力之处是在以事实为证据的基础上，考得了《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及其家世，使人们

摆脱了那种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去附会小说里的情节，影射时事、猜度秘闻的索隐派的窠臼，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局面。对此，顾刚先生在《红楼梦辨·序》中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按，此指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这并不是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出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当然，胡适的这种治学方法不是他单纯“假设”出来的，它是中西文化交会的产物。早年，胡适师事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信奉其学说，因而他的“假设”与“求证”“两步说”与杜威有系统的推理思考之“五步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不过，胡适又不完全照搬西人之学，又吸收、融入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合理成分，这主要是清代的“朴学”（即“汉学”）。他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因而他对清代汉学家的考据方法和他们在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诸种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深表钦服，并身体力行地继承和发展，而且直言不讳地说：“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方法来考证最普通的小说，教人知道治学的方法”（《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由此可见，胡适的治学方法，是西方杜威哲学和中国传统朴学的结合体，因为他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代，本身

具备了学贯中西、开拓创新的条件。由此他提出并实践这样的治学方法便是十分自然的了。

现在，我们祖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我们也面临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读书、如何治学？特别是迈向21世纪之时，这一点确实需要我们深思。在这方面，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推出这本小书。为方便读者，我们采取少而精的方式，没有选取胡适较大部头的著作，而是选取能代表和体现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治学方法而又通俗易懂的几篇文章，编成此书，并以“治学方法”为此书之名，或是或非，敬请读者赐教。

编 者

1999年11月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一、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1
二、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14
三、治学“四字诀”	26
——致陈之藩	
四、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30
——致罗尔纲言	
五、《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32
六、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50
附录：	
附录一 《清华周刊》记者来书.....	63
附录二 答书	65

一、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现在有许多人说：治学问全靠有方法；方法最重要，材料却不很重要。有了精密的方法，什么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绩。粪同溺可以作科学的分析，《西游记》同《封神演义》可以作科学的研究。

这话固然不错。同样的材料，无方法便没有成绩，有方法便有成绩，好方法便有好成绩。例如我家里的电话坏了，我箱子里尽管有大学文凭，架子上尽管有经史百家，也只好束手无法，只好到隔壁人家去借电话，请电话公司派匠人来修理。匠人来了，他并没有高深学问，从没有梦见大学讲堂是什么样子。但他学了修理电话的方法，一动手便知道毛病在何处，再动手便修理好了。我们有博士头衔的人只好站在旁边赞叹感谢。

但我们却不可不知道这上面的说法只有片面的真理。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绝大的不同。这个道理本很平常，但现在想做学问的青年人似乎不大了解这个极平常而又十分要紧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郑重讨论的

必要。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伽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Darwin）伯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能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成立于顾炎武同阎若璩；顾炎武的导师是陈第，阎若璩的先锋是梅鷟。陈第作《毛诗古音考》（1601—1606），注重证据；每个古音有“本证”，有“旁证”；本证是“毛诗”中的证据，旁证是引别种古书来证《毛诗》。如他考“服”字古音“逼”，共举了本证十四条，旁证十条，顾炎武的《诗本音》同《唐韵正》都用同样的方法。《诗本音》于“服”字下举了三十二条证据，《唐韵正》于“服”字下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

梅鷟是明正德癸酉（1513）举人，著有《古文尚书考异》，处处用证据来证明伪《古文尚书》的娘家。这个方法到了阎若璩的手里，运用更精熟了，搜罗也更丰富了，遂成为《尚书古文疏证》，遂定了伪古文的铁案。有人问阎氏的考证学方法的指要，他回答道：

不越乎“以虚证实以实证虚”而已。

他举孔子适周之年作例。书说孔子适周共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一、昭公七年（《水经注》）

二、昭公二十年（《史记》“孔子世家”）

三、昭公二十四年（《史记索隐》）

四、定公九年（《庄子》）

阎氏根据曾子问里说孔子从老聃助葬恰遇日食一条，用算法推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故断定孔子适周在此年。

这都是很精密的科学方法。所以“亭林百诗之风”造成了三百年的朴学。这三百年的成绩有声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证学，金石学，史学，其中最精彩的部分都可以称为“科学的”；其间几个最有成绩的人，如钱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孙、王引之、严可均，都可以称为科学的学者。我们回顾这三百年的中国学术，自然不能不对这班大师表示极大的敬意。

然而从梅鷟的《古文尚书考异》到顾颉刚的《古史辨》，从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到章炳麟的《文始》，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

我们试回头看西洋学术的历史。

当梅鷟的《古文尚书考异》成书之日，正是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文革命》大著出世（1543）之时。当

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成书的第三年（1608），荷兰国里有三个磨镜工匠同时发明了望远镜。再过一年（1609），意大利的伽利略（Galileo）也造出了一座望远镜，他逐渐改良，一年之中，他的镜子便成了欧洲最精的望远镜。他用这镜子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太阳的黑子，金星的光态，月球上的山谷。

伽利略的时代，简单的显微镜早已出世了。但望远镜发明之后，复合的显微镜也跟着出来。伽利略死（1642）后二三十年，荷兰有一位磨镜的，名叫李文厚（Leeuwenhoek），天天用他自己的显微镜看细微的东西。什么东西他都拿来看看，于是他在檐溜水里发见了微生物，鼻涕里和痰唾里也发见了微生物，阴沟臭水里也发见了微生物。微菌学从此开始了，这个时候（1675）正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成书的时候，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还在著作之中。

从望远镜发见新天象（1609）到显微镜发见微菌（1675），这五六十年之间，欧洲的科学文明的创造都出来了。试看下表：

年份	中 国	欧洲
1606	陈第《古音考》	
1608		荷兰人发明望远镜
1609		伽利略的望远镜

续表

年份	中 国	欧洲
1610	黄宗羲生。	解白勒 (Kepler) 发表他的火星研究, 宣布星行运行的两条定律。
1613	顾炎武生。	
1614		奈皮尔 (Napier) 的对数表。
1619	王夫之生。	解白勒的“行星第三律”。
1618—1621		解白勒的《哥白尼天文学要指》。
1622	毛奇龄生。	
1625	费密生。	
1626		培根死。
1628	用西法修新历。	哈维 (Harvey) 的《血液运行论》。
1630		伽利略的《天文谈话》。
		解白勒死。
1633		伽利略因天文学受异端审判。
1635	颜元生。	
1636	阎若璩生。	
1637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笛卡儿 (Descartes) 的《方法论》, 发明解析几何。
1638		伽利略的《科学的两新支》
1640	徐霞客 (宏祖) 死。	
1642		伽利略死, 牛顿生。

续表

年份	中 国	欧洲
1644		伽利略的弟子佗里杰利 (Torricelli) 用水银试验空气压力, 发明气压计的原理。
1656	阎若璩开始作《尚书古文疏证》, 积三十余年始成书。	
1657	顾炎武注《韵补》。	
1660		英国皇家学会成立。 化学家波耳 (Boyle) 发表他的气体新试验。(波耳氏律) 波耳的《怀疑的化学师》。
1661		
1664	废八股。	
1665		牛顿发明微分学。
1666	顾炎武的《韵补正》成。	牛顿发现白光的成分。
1667	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成。	
1669	复八股。	
1670	顾炎武初刻《日知录》八卷。	
1675		李文厚用显微镜发见微生物。
1676	顾炎武《日知录》自序。	
1680	顾炎武《音学五书》后序。	
1687		牛顿的杰作《自然哲学原理》。

我们看了这一段比较年表，便可以知道中国近世学术和西洋近世学术的划分都在这几十年中定局了。在中国方面，除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部奇书之外，都只是一些纸上的学问：从八股到古音的考证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终久还是纸上的工夫。西洋学术在这几十年中便已走上了自然科学的大路了。顾炎武、阎若璩规定了中国三百年的学术的局面；伽利略、解白勒、波耳、牛顿规定了西洋三百年的学术的局面。

他们的方法是相同的，不过他们的材料完全不同。顾氏阎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伽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实物的。文字的材料有限，钻来钻去，总不出这故纸堆的范围；故三百年的中国学术的最大成绩不过是两大部《皇清经解》而已。实物的材料无穷，故用望远镜观天象，而至今还有无穷的天体不曾窥见；用显微镜看微菌，而至今还有无数的微菌不曾寻出。但大行星已添了两座，恒星之数已添到十万万以外了！前几天报上说，有人正在积极实验同火星通信了。我们已知道许多病菌，并且已知道预防的方法。宇宙之大，三百年中已增加了几十万万倍了；平均的人寿也延长了二十年了。

然而我们的学术界还在烂纸堆里翻我们的斤斗！

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且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的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

自然科学的材料便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